

从“地域”出发——笔谈(十)

写作者要有能力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

——浅论新时代河北小说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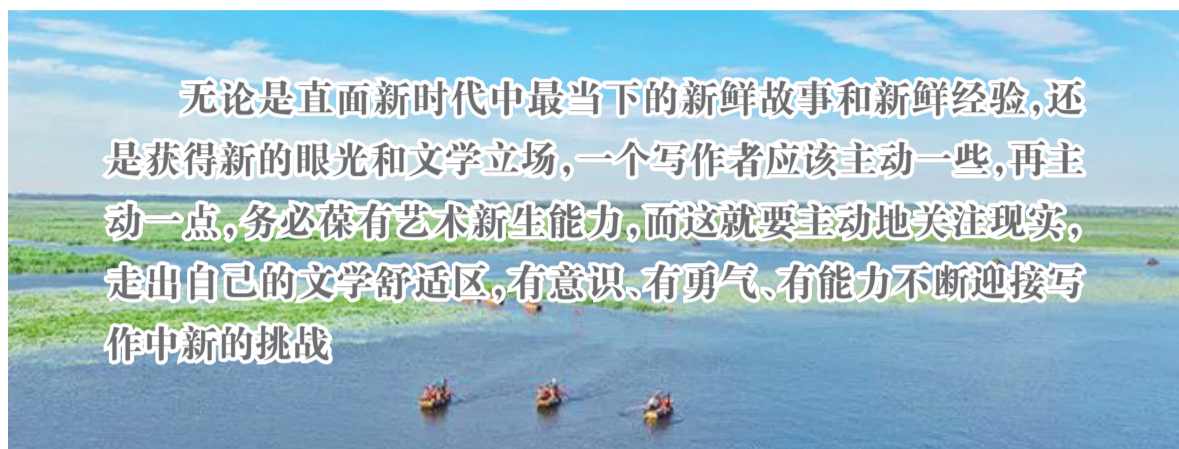
□金赫楠

创作与时代的关系作为经久不衰的文学话题,始终参与着文学现场的重要讨论与文学史建构。而当我们谈论新时代文学,我想,至少能在两个方向深入:一是新时代的社会图景、历史进程,那些翻天覆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些新鲜的经验,为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灵感和素材。而更深一层的理解和把握,则在于时代作为大背景、大环境,对写作者更深远的影响,是其观照生活和世界目光的一种调整与重新塑造。写作固然是极具个体性的艺术创作,但这个个体不是凭空而来的,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和笔力是内外因综合因素建构而成的,他的深度、厚度,他的文学立场,一定是特定环境和情境下的产物。身处新时代,其间的社会变迁持续为写作者带来审美、智识和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改变、塑造着他们看待、理解世界的关注视角和着力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河北新时代小说创作,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构成、知识背景与手法特征的小说家们,在不同的写作方向和文本面貌上诠释着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关仁山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是新时代河北小说创作的最重要收获之一,这是一本以当下乡村振兴、新区建设为背景的小说。熟悉关仁山小说创作的读者都知道,他的写作一直在变与不变之间行进,作品几乎全部围绕农村题材,关注历史行进中动态的中国农村,其文学关键词是与大时代的同频共振。小说家对新鲜经验的处理,终究还是着落在对人的塑造、对历史行进中文学新人形象的发现和描摹,以及如何用这些人来表达作者对于当下的了解与理解,如何以此记录时代。《白洋淀上》塑造了一群“留下来”的乡村年轻人,他们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机遇中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能手。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我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几乎全都是向外走的乡村青年形象,“到世界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几位留下来的年轻人有了足够的精神信念和事实层面的支撑。主人公莽麦和王决心在自己的青年岁月恰逢新时代的伟大复兴,新区的设立对于当下中国、对于身处其间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影响。

河北作为农业大省,扶贫攻坚题材是新时代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比如贾兴安长篇小说《风中的旗帜》、水士长篇小说《还你一个仙女湖》、朱阔平中篇小说《护林侯》等,文本风格各异,但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处理新时代新鲜经验时,着重呈现了人物自己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投身其中,他们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和拥抱时代,怎样在时代的奋进和机遇中完成自我成长和



无论是直面新时代中最当下的新鲜故事和新鲜经验,还是获得新的眼光和文学立场,一个写作者应该主动一些,再主动一点,务必葆有艺术新生能力,而这就要主动地关注现实,走出自己的文学舒适区,有意识、有勇气、有能力不断迎接写作中新的挑战

实现。而当我们这些作品中理解了王决心、莽麦(《白洋淀上》)、李成功(《还你一个仙女湖》)、王金亮(《风中的旗帜》)等人物的行动和选择,加深了对于新时代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区建设的了解和理解——这是文学意义上对时代的阐释和记录。人物与自己正身处其中的时代早已深刻交融,讲述、记录和印证时代,在深深镌刻时代烙印的同时,必会转身成为某种意义上时代的一种推动力量,我们将会现实和文本中看到更多的新人和文学新人。

当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够用“正面强攻”的方式直接讲述时代,但所有写作者都身处时代的浸润之中,无论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一个作家此时此地的审美趣味、行文风格以及情感资源和文学立场,其实都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悄然生成的。

刘建东和李浩一直被视作带有鲜明“先锋”印记的写作者,谈及二人的小说创作,评论家与读者往往会想到他们与先锋文学的关联,在一系列创作谈和访谈对话中,二位作家更是毫不避讳先锋文学的小说理论与实践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和“影响的焦虑”。而在他们的近作中,李浩《灶王传奇》与刘建东《无法完成的画像》似乎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同于李浩以往作品的明显的“思想”和“概念”特质,《灶王传奇》表层故事线是以灶王为代表的中国民间神话谱系,有人评价说这是“传统与先锋的并置”,李浩自己也表示志在呈现“现代精神和重新挖掘的民间传统”。精读小说我们会发现,“灶王”故事之下贯穿的仍是李浩一直最在意的问题:文学是否有能力、有途径解决这个时代的某些现实疑难和精神困境——这构成《灶王传奇》的变与不变。刘建东《无法完成的画像》,

不同于之前的知识分子或者工厂学校题材,作家的目光、情感转向了历史深处——刘建东坦陈这篇小说是自己革命史学习的文学成果,而这种浸润带给了作家对历史更深的敬意和探究心。小说处理的是历史风云中一段极具体、甚至边缘的个体经验,但又分明是英雄儿女的家国天下与风云际会,塑造了革命历史年代一位抛家舍业、忠于信仰的革命烈士形象。我们从故事的背面间接感受到了故事正面的壮阔、轰烈、宏伟,更深入时代的肌理和自我内心。文学固然可以从正面强攻一个时代、一些宏大壮阔的人生和社会景象,还可以打开和深入它的不同面向,更细致地探看和聆听,而最重要的终究是那些“文学意义上、审美意义上的真实和真理”。还有张敦的《小秋在大理》、孟昭旺的《少年游》,以及刘荣书的《信史》,虽然的《高考小史记》、贾若萱的《圣山》、梅驿的《空房子》、唐慧琴的《嫦娥奔月》等小说,我们从中都明显能看到一个写作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新时代语境中对自己的不断调整。

诚然,无论是直面新时代中最当下的新鲜故事和新鲜经验,还是获得新的眼光和文学立场,一个写作者应该主动一些,再主动一点,务必葆有艺术新生能力,而这就要主动地关注现实,走出自己的文学舒适区,有意识、有勇气、有能力不断迎接写作中新的挑战。作为外部环境,作为文学写作不断刷新的情境和语境,时代进程始终为小说家们提供着更多的情感题材来源,提供着更广阔的认知视野与更深厚的审美沉淀,写作者必须有热情、有能力回应时代提出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时代前行,而写作也一直在路上。

(作者系河北作协文学院副院长)

文学名刊 主编谈

“假如说《百花洲》真有一种什么风格,那就是始终把作者揣怀里、将读者当衣食父母的风格”



近来因为梳理《百花洲》历史,把编辑部储藏的旧杂志悉数翻出,时间久了,柜子里积着厚厚的书香,纸也变得蓬松泛黄。同事们在翻找的过程中,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工匠细致打磨下温暖潮湿的春泥。

转眼之间,《百花洲》就45岁了,在精神的意义上,它的年龄却远远大于一个人的45岁,因为它容纳了太多写作者的才情与经验。它们堆积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特别庞大的文学容器、精神容器。今天,人们称《百花洲》是一份老牌刊物,它,并不是说它有多白发苍苍,而是它参与到了代又一代写作者的思想建构中,它始终是一个在场者。人们只要提到它,自然就会想起生命中的许多过往、惊讶于文学生命力的顽强。江水奔腾,大浪淘沙,许多东西已经不复存在,没想到它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扎下根来,让人看到一些属于精神的事物还在延续血脉。《百花洲》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它最直接的来由,无非是南昌的一处地名。外地人到了南昌,大抵都要登滕王阁,访“八大山人”,除此以外,百花洲也是不得不去的。百花洲不仅是东湖中间的一个小岛,它也是古往今来让无数被时间阻隔的文人的相聚之地,李绅、杜牧、黄庭坚、辛弃疾、欧阳修、文天祥把满腔忧思、满腹文采带到这个洲上。他们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把鸟鸣嚶嚶当做文学表达,把桃李争春当做文学色彩。《百花洲》就诞生于这深厚的文学传统中。

最近,我读到杂志创办人汤匡时先生的回忆文章。1978年,汤先生在刚刚恢复运转的江西出版社里与其他两位同事轮流编一份文艺丛书,主要就是为省内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块创作园地。没想到冬去春来,外面的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某日,他惊喜地看见刚刚创办的《当代》,不久又读到《十月》,欣喜若狂,他用耳朵贴近这些接踵而至的文学刊物,内心怦怦直跳,仿佛听见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学呼声正远远涌来。很快,大家就萌生了创办《百花洲》的念头。当时的小组负责人是喻建章先生,那年喻先生已年过半百,世事沉浮,他的目光异常深邃,这位出版人很快就拿定了主意,他清醒地意识到创办一本文学刊物将挂起一张多大的帆。在他的鼓舞下,人们撸起袖子,一切都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当重新翻看《百花洲》创刊号,我们发现,那本还没有来得及划分栏目的杂志就像是一个尚未成型的星体,它活跃、璀璨,显示出办刊人积蓄已久的热念。编辑们各自利用手头那一点老关系把约稿信寄出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热念就像是一簇簇火苗,它来不及准备,但是很快就把一方文学的天地给照亮了。

回顾《百花洲》的光荣过往,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人们称它为名刊,所指也不只是名气与名望。“名”的另一层意思,即自我指认。上世纪80年代,《百花洲》向国内文坛推介过一大批外国文学,几乎每期杂志都要拿出大块版面译介外国作家的作品。后来,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纪实文学。这些作品,领时代之先,既透出一股锐气、摇曳着先锋文学的色彩,又不失厚重感与人文性。80年代,几乎每年,《百花洲》都在庐山开办庐山笔会,作家们畅叙抒怀,缔结了一辈人的友谊。几十年来,先期识而后文艺的传统始终都在。有时候,我去外地参加活动,遇见但几年长一点的作家,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当年在庐山与《百花洲》相遇的美好时光。尽管岁月总是催人老,但是那份文学情感却始终那么真切。重温历年《百花洲》,常常遇见各种如雷贯耳的名字,可在当时,他们也不过是初出茅庐,顶多算一个文学新人,能在《百花洲》发篇稿子,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经年累月,当年的蓓蕾早已名扬四海。刊物与作者之间,永远是互相成就的。杂志用它的持之以恒构建了文学的历史长河,这条河从来都不是静止的,河水泱泱,它在快速流动,而河流上的船只也在不断消逝与涌现。假如说《百花洲》真有一种什么风格,那就是始终把作者揣怀里、将读者当衣食父母的风格,文学作品的传播与经典化的过程,作者的努力与编者的精心打磨自然必不可少,但读者所持的审美也始终是一个有效且有魅力的向度。

面对前辈们留下的巨大“家产”,有时候我竟觉惶恐。在网络化时代,文学聚焦的效益日渐衰微,过去的“文学整体性”不断地被拆分与瓦解,许多能量都蔓延出去了,热闹也变得寂寥了。尽管纸媒的主权在不断旁移,但人们的欲望与情感中仍然需要文学,内容仍然是杂志不可或缺的主体。

45年了,《百花洲》所经历的,正好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人精神与物质生活里的变迁。在纸媒会不会消亡的问题上,我们始终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但不论哪一种,文学的根本总会借助于某种载体存在下来。近年,《百花洲》在上级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名刊重塑”工程,这当中的多项举措其实都是围绕着读者、作者与内容等母体而展开的:提升稿酬旨在呼唤文学精品、予作家的精神劳动以应有尊重;重启庐山笔会是为搭建交流互鉴平台、赓续“以文会友”的传统;成立《百花洲》高校文学社联盟,期待的是更多年轻力量的汇聚……正如从影片《长安三万里》中,我们看见了一个真实的长安,长安并不是虚构的,它聚集着像李白、贺知章、高适、张旭等一批才华出众者。每一本有理想的文学刊物都有理由成为自己的“长安”,这里面洋溢着办刊人的热情,收纳了广阔的生活形态,布满了通往思想迷宫的入口。“百花洲”描述的也是一个文学生态——“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终究化作春泥,由层层春泥累积起来的文学大洲,正向着广袤的世界传递文学刊物的无限风采。

(作者系《百花洲》执行主编)

应成为庞大的精神容器 有理想的文学期刊

□朱强



■第一感受

《少水鱼》:

卢一萍的荒诞术

□凸凹

卢一萍承续其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白山》的离经叛道脉向,再次在新作《少水鱼》中施行了他驾轻就熟、如鱼得水的荒诞术。故事从“朕出身于一个贫苦皇帝家庭”开篇,讲述了自清嘉庆二年(1797)拥兵1200余众的李能在集州登基称帝创立新唐国后,其寿数长过百年的继位者李宗羲,亲率以李氏皇族五代血脉为核心的举国之民,所展开的一场百年复国长征。新唐从长江上游蜀地巴州的大巴山“乐坝”,辗转到长江下游江南一带的多个地方,又从东海荒岛重返大巴山“乐坝”。其间,历经了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军阀割据等重大历史事件。新唐在海上称霸鼎盛时,臣民一度达十多万之众,后为了李宗羲的帝王梦,只余老弱病残二三百人。

显然,这是一个近乎荒唐的荒诞故事。而荒诞是一种上得了美学台面的艺术,荒唐却是一种闹剧。这样的故事,一般作者想都不敢想,更莫说付诸于一场动辄40万言的辛劳与探险。当然,这只是读者的直觉臆断,读后会发现,所有的荒唐,在作者荒诞术的唤魂和补水过程中,获得了还魂和新生,实现了艺术的真实——明知是假的,也乐意当作一桌美肴来津津有味地品尝。

我还好,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故事并不荒唐,如果非要认为它荒唐,那也是世界荒唐,现实荒唐。小说的肇始爆点,是李家开国皇帝李能将自己的血脉与大唐太子李贤搭上关系。我40多年前去过卢一萍的出生地巴中,至今都记得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太子贬巴州的故事。李贤是唐高宗李治第六子,女皇武则天次子。太子李弘猝亡后,册立为皇太子,后以谋逆罪废为庶人,流放巴州,最后被武则天逼令自尽。将族谱的血脉修纂到皇族的名下,这种事很多,不足为奇。有人甚至上溯到了宋以前——须知族谱是宋代以后才逐渐在民间兴起的。以我所在的龙泉驿为例,好些姓氏尤其客家人的族谱,周文王、刘邦、刘备、李世民等名字赫然在册。再者,我在卢一萍老家所在的大巴山生活过20多年,听闻过称帝奇事,比如,有个贫苦农民,一觉醒来,称自己已变身为皇帝,当地村人必须按皇官

规制,让他享受贡品、妃子等一应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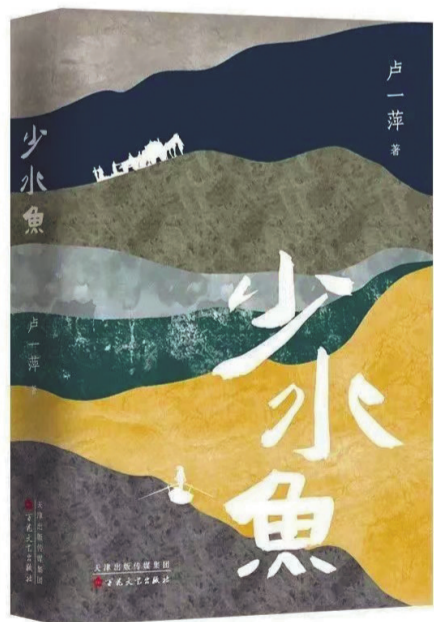
有过皇帝梦而又行动起来让梦成真的人,到底是极少地域中的极少数。但少也是一种存在,存在即合理,尤其当现实的魔幻已然超过小说,《少水鱼》的故事编织、题材架构,自然就有了自动生成的变荒诞为真理的逻辑厚土。

作者设计了这么一个让人心向往之、欲罢不能的堪称帝国层面宏大叙事的复国、开国、立国、扩国、护国故事,却不是从此故事到此故事,从大到更大,而是从此故事到彼故事,从小到大。他把这个庞大到改朝换代的战争题材,用来作了另一个故事的大背景、外包装和蜀土几水一般的流水——另一个故事是爱情故事。他把李宗羲承继父皇遗志,百折不挠建新唐国的严肃正事,写成了李氏家族一代一代矢志不渝建新唐唐爱情国的桃花情事。将国事写成情事后,一路下来,就自然成了各类人物、各种细节、多维密度和万千深谷,然后便有了众多、丰饶与大。本是创建政治经济文化有形的新唐国,最终却创建了文化的爱情国。没错,卢一萍让李宗羲用建国的失败,成功建造了一个庞大、坚固的爱情国。由是我们恍然,原来,《少水鱼》是一部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爱情小说。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于人这种高级生物而言,爱情是超越政治、经济、军事和世间万物的青鸟,是生理的本欲展形和生命中的那道光,更是身体和精神的尊严与价值。在角逐宝贵、有限又难得的爱情过程中,饮食男女本事尽展,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爱情,《少水鱼》里的人物个个能征善战,人人皆为多愁善感的情圣。77岁的李能,可以娶19岁的柳氏;李宗羲可以娶仇人之女燕古雪,可以夺人(儿子李方吾)所爱(林景芳);太子李方吾可以与风流情人赵小媚诞下女儿李娥儿,可以因林景芳放弃太子位遁入几水不知所终……

正是因为有了爱情,《少水鱼》中的万物便有了灵,它们纷纷出场为爱情帮腔,以致动植物会说话,山水会动情,亡魂会显形,睡梦会成真,连腹中的胎儿也会倾听和观察周遭的情事国事。卢一萍的想



《少水鱼》,卢一萍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象力、编故事能力和调动万物的能力,在此得到了充分铺排。

正是新唐国写到了另一边去,将其国家功能写成了守护新唐爱情国的国境线。

《少水鱼》不仅把我们所能想到的爱情写到极致,还将新唐国写到了另一边去,将其国家功能写成了守护新唐爱情国的国境线。

《少水鱼》中所有的爱情呈现,都是包括情圣主人公、普通人(张王氏)在内的各色人物的亲见、亲闻、亲感与亲述。作者的这一安排与结构,让读者通过爱情的深渊,抵达了人性的幽微、生命的本质与时间的真相。

(作者系成都市作协副主席)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主办